

17

(荷兰) 约翰·赫伊津哈
Johan Huizinga
何道宽 译
著

17世紀的 荷蘭文明

Dutch Civilis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Other Essays

17

Dutch
Civilis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Other Essays

世纪的荷兰文明



合同登记号：图字 19—2009—028 号

Copyright © 1941 by Johan Huizing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7 世纪的荷兰文明 / (荷) 赫伊津哈著；何道宽译。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5
(双狮译丛)
ISBN 978-7-5360-5915-3

I. ①1… II. ①赫… ②何… III. ①荷兰—近代史—
研究—17 世纪 IV. ①K563.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3521 号

责任编辑：林宋瑜 揭莉琳

技术编辑：薛伟民

装帧设计：梁丽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20 开

印 张 14 2 插页

字 数 220,000 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中译者序

一、喜爱

这是我翻译的荷兰史家约翰·赫伊津哈的第四部著作，前三本是《游戏的人》（花城出版社）、《伊拉斯谟传》和《中世纪的秋天》（广西师大出版社）。四本书的翻译是学习欧洲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的过程。因为喜爱《游戏的人》，我倾情写下一万五千字的长序；经责任编辑林宋瑜老师的鼎力推荐，该序在《南方文坛》2007年第六期刊出，这篇题名《游戏、文化和文化史——〈游戏的人〉给当代学者的启示》的文章荣获《南方文坛》2007年年度优秀论文奖。接着，我又欣然接受张晓红博士和广西师大出版社老总何林夏的委托，于2008年翻译出版了《中世纪的秋天》和《伊拉斯谟传》。《秋天》对中世纪欧洲史做了崭新的解读，使人明白，原来中世纪并不那么“黑暗”。《伊拉斯谟传》使人了解这位北欧人文主义、文艺复兴的巨人，他的精神成为荷兰的重要遗产，为荷兰的宗教宽容、民族和谐奠定了基础。

以上三本书得到国内学界和读者的肯定甚至喜爱，令我十分欣慰。如今奉献给读者的《17世纪的荷兰文明》至少在两个方面非常吸引人：（1）作者以深刻细腻的洞察破解了荷兰文明兴衰之谜，可以作为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电视纪录片的完美补足；（2）他那司马迁式的笔法使历史事件和人物栩栩如生、生动传神。读者将会看到，他为何主张历史著述里的直觉、想象力和审美要素。

二、奇迹与谜团

关于17世纪荷兰的黄金时代，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电视纪



录片里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仅有 150 万人口的荷兰，将自己的势力几乎延伸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被马克思称为当时的‘海上第一强国’。”我们先看一些简单的年代、大事和数据，借以快速扫描荷兰崛起的奇迹。

1579 年，荷兰北方相对落后的几个省结成“乌特勒支同盟”，成为一个准国家；

1581 年，该联盟废除西班牙国王对荷兰各省的统治权；

1588 年，北方七省宣告成立联省共和国；

1602 年，东印度公司成立，开始海外殖民、拓展海运、发行股票、活跃金融；

1609 年，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诞生；

1648 年，西班牙被迫同意尼德兰独立；

尼德兰共和国迅速崛起，成为当时最强大、最繁华的世界强国。以下是它强大的几个数据：

17 世纪上半叶，荷兰拥有 16000 多艘商船，其吨位占欧洲的 4/5，相当于英国的 4—5 倍，法国的 7 倍，荷商船队的吨位是英、法、葡、西四个世界强商船吨位的总和。

本书告诉我们：“就在伦勃朗诞生（1609）之前 50 年，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我们现在所谓的荷兰民族。”（10 页，引文均为英文版页码，下同）

如此弹丸小国，竟然在建国一百年、独立 50 年后“突然”成为世界强国、欧洲中心，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这个蕞尔小国还是一个文化大国，近代以来涌现数以十计的世界级文化巨人，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博学鸿儒就有：人文学者伊拉斯谟、哲学家斯宾诺莎、数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国际法先驱雨果·格劳秀斯、大画家伦勃朗和梵高等等。真可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还要记住，创造这个奇迹的，实际上主要是共和国 7 个省中的荷兰省，而且还是荷兰省内的一部分。赫伊津哈说：“伦勃朗时代的荷兰文明集中在 60 余平方英里的狭小地区。如此文化荟萃的现象能够在彼时彼地出现，这实在是最令人惊叹的事实。”（15 页）

它崛起的原因何在？归纳起来是两条国策：海洋运输立国、商业立国。这是荷兰崛起的两大经济支柱。当然这背后还有国民性格和文化因素，下文再表。

17世纪刚过，荷兰的黄金时代迅即落幕，像西班牙、葡萄牙一样，这个强国迅速衰落，其霸主地位被新兴的强权英国和法国夺占，19世纪初，它竟然短期内并入了法国！

其衰落原因何在？是风水轮流转吗？是上帝的惩罚吗？都不是，其衰败原因还是出在那两条国策上：荷兰的海洋运输和商业迅速萎缩，从原来的民富国强变成民穷国弱了。

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电视纪录片尝试做了这样的解答：“‘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在荷兰身上应验了，过度依赖外界的经济和各行其是的地方政权使荷兰受制于人，这是荷兰走向衰败的原因。”

赫伊津哈尝试对衰落做出这样一些解答：“我们的普遍繁荣也有对社会危险的一面……民族的大量精力在这样的玩赏中消耗掉了，这是毫无疑问的。”（102—103页）17世纪“战争结束，宁静似乎掌握在大多数尼德兰人的手中，普遍而长期的繁荣就有了保障。大片的避暑房屋拔地而起，从富豪和权势者的城堡和豪宅到殷实贸易商小型的圆顶别墅应有尽有。高水准的生活方式天下无敌无双，同时，公共安全程度亦世所罕见，外国游客把我国视为名副其实的天堂了”。（102页）

当然还有其他的解释比如地缘政治的变化、科学技术中心的转移、文明中心的转移等，但这些变化并不是本书探索的范围。

三、各章提要

本书分上下两部，第一部《论尼德兰》，解读荷兰的黄金时代及随后的衰落，收录赫伊津哈的两篇论著，分别是《17世纪的荷兰文明》和《尼德兰的精神》；第二部《论历史》，讲述荷兰在欧洲的独特角色和作者本人独特的治学之路，批判施本格勒及其《西方的衰落》、威尔斯及其《世界史纲》，收录的篇目是《作为西欧和中欧中



介的尼德兰》、《与天使角力的两位史学家》、《史学思想里的审美要素》、《我的史学之路》。

《17世纪的荷兰文明》论荷兰的“黄金时代”，深刻洞见尼德兰联合共和国黄金时代的特质；《尼德兰的精神》论民族性格；《作为西欧和中欧中介的尼德兰》论荷兰在西欧和中欧文化影响中居间的独特地位；《与天使角力的两位史学家》批判施本格勒《西方的衰落》和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史学思想里的审美要素》、《我的史学之路》显示了赫伊津哈研究历史理论的独特路径和辉煌成就，肯定治史的审美要素，反对把史学变成“科学”。

四、本书亮点

1. 破解荷兰崛起之谜

在荷兰共和国成功的原因中，赫伊津哈着重强调商业成就和社会和谐，尤其强调教派关系政党政治的和谐，不太愿意进一步追寻其他的原因。比如，他肯定加尔文教的建国和卫国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但他否认该教派主导着17世纪尼德兰的精神生活，也否定加尔文教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因。看来，他是不同意马克斯·韦伯把新教伦理作为资本主义成功的首要原因的。他用一连串的疑问来否定韦伯等人的夸大之词：“加尔文教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荷兰文化的发展？它在宗教生活里的作用是否超过了酵母的作用呢？换言之，它是否是这个年轻民族的思想社会进步的驱动力呢？它是否有助于荷兰思想结晶成形呢？是否为荷兰艺术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呢？试图解答这些问题的人很快就会发现，他们遭遇到了难以回答的问题。”

(58页)

他本人深受伊拉斯谟思想的影响，所以他特别强调荷兰社会的和谐：“荷兰国内的反差比英格兰小得多，争议不那么大，冲突时间短暂，不足以损害荷兰政体的基础，也不足以损害国家机器的顺利运行。比较自由的政党和正统的政党融合了，而且其融合几乎是不

知不觉间完成的。”（57页）

他以论战的姿态断然否定其他各种解释：“17世纪荷兰繁荣的原因显而易见，再添加其他的原因去进行解释，实在就没有必要了。30年前，许多历史学家还热衷去假设其他一些影响比如资本家的思想、加尔文派的创业精神，现在看来是没有必要的。繁荣自然而然地从中世纪的体制中流淌出来；从来就不曾有过旧体制被刻意摆脱、新体制受热烈欢迎的断裂点。”（24—25页）

不过，他并不否定法国等地的新教徒难民带来的先进思想、科学技术和经商头脑。在稍后那篇论荷兰中介作用的文章里，他强调了精神文化交流的作用，详见下文。

笔者想根据自己的心得做一点补充。我在《游戏的人》的长篇序言里，从两个方面做了探讨，现抄录如下：

历史何以成就这样一个文化大国呢？这是我有兴趣长期探索的一个问题。限于我目前的研究，主要是这么两个原因：

(1) 1568年荷兰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场资产阶级革命，1581年荷兰共和国诞生，生产力得到解放。工商业、交通运输、金融业、证券业、印刷业的迅猛发展，加上学术自由的政策，荷兰取代法国而成为西欧的学术中心之一。几百年来，由于社会发展和学术繁荣齐头并进，这个远方的小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

(2) 学术中心转向荷兰。16世纪末，由于专制皇权和宗教思想的压迫，法国的大学者们流亡到学术自由的荷兰。从此直到19世纪，荷兰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学术圣地之一。^① 法国启蒙运动的主将和“百科全书”派的许多著作，都是“出口转内销”，先在荷兰印刷出版，然后才偷运回法国的。经济的发达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印刷品源源不断地走私到法国。法国对出版自由的压制，成全了处在边缘的自由国家的出版自由。在19世纪的法国，对出版审查的逃避，表现在《百科全书》撰写和出版的过程中，反映在伏尔泰和卢梭的著

^① 《传播的偏向》，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9页。



作中。”^①“印刷工人从法国移居到邻国瑞士与荷兰，把书印好后又走私运回法国……荷兰的印刷业取得长足的进展，……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地位上升。”^②“法国的国家干预，使纸张供不应求。与此同时，荷兰通过引进却大大促进了造纸工业。法国的难民推出了批判的文学和哲学，培尔和笛卡儿即在其中。”^③“从 1587 年斯卡利杰移居荷兰莱顿那一天起，法兰西共和国的学术霸权就让位给荷兰人了。”^④“法国一方面限制书的出版，一方面鼓励纸张的生产……给邻国提供生产书籍的物美价廉的原材料，这些书又从邻国走私回法国。”^⑤“莱顿大学成为学术和学习的中心，吸引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科学家。”^⑥自此，莱顿大学成为世界著名大学，它已经并将继续吸引许多中国学者。

2. 荷兰文人的介绍和比较

赫伊津哈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学生时代就是荷兰 19 世纪“八十年代文学运动”的追星族，组织俱乐部研讨那批生气勃勃的诗人；可惜他的主要兴趣是比较语文学和历史学，无暇创作。但由于他终生关注文学运动，所以他能够恰到好处地介绍和评价十来位荷兰最著名的文人。冯德尔是“远超诸雄”的诗人，可惜他生前默默无闻。

^① 《传播的偏向》，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20—21 页。

^② 《传播的偏向》，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43—44 页。

^③ 《传播的偏向》，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44 页。

^④ 《帝国与传播》，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158 页。

^⑤ 《帝国与传播》，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159 页。

^⑥ 《帝国与传播》，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159 页。

布雷德罗是鞋匠的儿子，才华横溢，诗情燃烧，却英年早逝，33岁即撒手人寰。霍夫特是市长儿子，位高权重，生活优渥，尽穷毕生精力完成20卷《荷兰史》。惠更斯父子学有传承，但路子不同，父亲康斯坦丁·惠更斯是政治家和文人，儿子克里斯蒂安·惠更斯成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雅各布·卡茨是荷兰大议长、画家、诗人，荣誉冠盖，职位众多，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安稳走过一生，享年83岁。雨果·格劳秀斯是国际法鼻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国外。这方面的内容众多，容我不赘。

3. 对荷兰艺术家的研究和评价

赫伊津哈陶醉自然，擅长审美直觉，能够作画，所以他特别喜欢又特别擅长研究荷兰艺术和艺术史。他不是艺术史家，却又胜似艺术史家。他的《中世纪的秋天》就偏重从文学和艺术研究中世纪晚期的历史。该书专辟两章讲文学和艺术，第十二章《生活中的艺术》介绍各种艺术的宗教意义和实用功能，第十三章《美术与文学》是该书的重中之重，介绍了各种形式的诗歌，用45个图版详细介绍爱克兄弟、林堡兄弟等人的艺术作品。

《17世纪的荷兰文明》介绍了几十位荷兰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画家有爱克兄弟、戈延、斯腾、哈尔斯、杨·伯塞利、弗美尔、霍赫、费尔德、雷斯达尔、勃鲁盖尔、亚德里安·布劳尔、彼得·萨恩勒丹、伊曼纽尔·德维特、斯霍雷尔、海姆斯凯尔克、巴伦德·法布里蒂厄斯、兰伯特·杜梅尔、詹森·休伦、赫拉克勒斯·塞赫尔斯、罗兰德·罗夫曼、西蒙·德·弗列格、彼得·奥斯塔德、保罗·波特、凡·德·海登、伯克海德、比尔斯特拉滕、杰拉德·莱雷斯；雕塑家有亨德里克·凯泽、龙布特·维赫尔斯特；建筑师有列文·德·基伊、菲利普·文布恩、杨·凡·坎彭。

这三大门类的最大特点分别是：绘画尤其油画特别发达，自成一体、自成一派，普及程度之高、成就之大恐怕在各国之上，有人估计，17世纪荷兰的油画作品上千万件，几乎深入到每个家庭。雕塑不太发达，因为荷兰没有国家和教会的大笔投入。由于同样的原



因，建筑成就也难以跻身欧洲强国行列。

凡·爱克曾经把油画的兴起归功于低地国家。弗兰斯·哈尔斯首先是自然天成的人，没有丝毫的精心策划、刻意而为，没有一丝苦心经营或矫揉造作（83页）。弗美尔的画中人物与其说是16世纪荷兰的妇人，不如说是来自挽歌世界的人物，和平、宁静（83页）。在心灵深处，伦勃朗是国家和人民真正的儿子；你通过伦勃朗去把握尼德兰，又通过尼德兰去把握他（90页）。伦勃朗始终在努力描绘一种不同于荷兰共国有资产阶级生活的另一种生活……他用极其细腻的画笔表现和他最接近的人，但并不是想要展现他们，只不过是要创作漂亮的画作而已（88—89页）。

4. 荷兰的中介作用

赫伊津哈指出，在国际交流和国际事务中，荷兰曾经是政治上的斡旋者、战事中的调停者、精神上的中介者，她以开放的姿态接受异域文化、同时又以自己的文化影响他人。荷兰语曾经是波罗的海国家的外交语言，曾经是与英国交往的外交语言。荷兰在西欧文化和中欧文化之间发挥了中介的作用。他举的例子很多，我们只能择要列举并予以说明。

首先，低地国家的中介作用和荷兰人的民族性格不无关系。温和的性格、宽容的社会氛围使17世纪的低地国家成为国际交流的重要场所。伊拉斯谟温和的性格特征既反映了荷兰民族的性格特征，又反过来对其产生持久的影响。伊拉斯谟是彻底的国际主义者，他为宗教改革准备了思想条件，从教皇开始的各种基督教教会都受到他的影响，新教各教派的领袖比如路德、加尔文、茨温利无不受到他的影响，天主教的改革人士比如耶稣会的创建者罗耀拉也受到他的影响。在人文主义者、宗教改革家和广大基督徒中，他是北方圣人、北方明灯。“伊拉斯谟与五湖四海的各色人等通信，朋友不仅遍及西班牙和英格兰，而且远至波兰和匈牙利，他忠告智者腓特烈如何对待路德，他劝告帝王（虽不成功）实施和平政策。整个欧洲都聆听他的教诲，把他当作先知圣人。我们不妨问：他是否首先是中介人，

然后才是精神向导呢?”(149页)

17世纪后半叶，法王路易十四实行高压统治，镇压新教徒，剥夺其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使法国蒙受惨重损失，却给荷兰送上大礼，因为大多数被镇压的胡格诺教徒是知识分子、印刷商和商人。接着在18世纪，瑞士的伯尔尼和德国的萨尔茨堡又分别驱赶门诺教派和路德派，而荷兰则以宗教宽容的心态接纳这些流亡者。

上文业已提到荷兰大学的中介作用，这里再做一点补充。“荷兰之所以成为东南西北各方的中介，多半要归功于其大学。各国学者在这些大学里会晤、互赠图书、交换思想……整个17世纪以及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莱顿大学、格罗宁根大学和乌特勒支大学都吸引了大批的英格兰、法国、苏格兰、丹麦、瑞士、波兰、匈牙利尤其德国的大学生……17世纪在格罗宁根大学执教的52位教授中，17位是德国人；在莱顿和乌特勒支大学，外国教授为总数的六分之一。”(150—151页)。

赫伊津哈的结论是：荷兰的开放度罕有能与之匹敌者，荷兰综合各国优秀文化的能力也非常出色，兹征引三句话作为这一节段文字的小节：

“虽然我们的国家位于法兰西、德意志和英格兰之间，但它与这些国家截然不同，其差异表现在许多方面，所以它是欧洲的例外，它不符合欧洲普遍的规律。”(11页)

“我们对外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保持开放，世界各国罕有更加开放者。这一伟大的开放心态使我们成为最卓越的中介者，即使我们除此之外的作为不多，它也会使我们卓尔不凡；吸收、同化、传递外域文化成分使我们的卓越实至名归。”(154页)

“荷兰人的思想和德国人的思想有亲属渊源，和英国有历史联系，和法国有文化纽带，所以他们的头脑对这三种思想影响的接受程度是同等的。”(155页)

5. 对施本格勒和威尔斯的批判

第一次世界大战重挫了西方文化，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浩



劫，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危机令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非常痛苦，他们对西方文化做了全面的反思。反映在史学研究上，最重大的成果就是两部历史巨著。一本的德国人施本格勒的《西方的衰落》，1918年问世，一本是英国人威尔斯的《世界史纲》，1920年出版。这两本书对中国思想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施本格勒既有日耳曼人的严谨，又有日耳曼人的骄狂，他的书好则好矣，却曲高和寡。威尔斯以他科幻小说家的优势用深入浅出的文字讲述历史，影响更甚，他的书煌煌一百余万字，却能使一般人通读，《世界史纲》影响了两三代的中国知识分子。

我认为，这两本书的最重要差别是：《西方的衰落》更富哲理、更趋严谨，但存在严重的日耳曼偏见，调子悲观；《世界史纲》具有鲜明的“票友”特色和乐观主义倾向。我们说威尔斯是“票友”，因为他的“本行”是科幻文艺，他的作品如《时间机器》影响了各个国家、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的读者。他的乐观主义不但见诸他的文字和结论，而且反映在他那“反常”的广阔“历史”范围里，一般的世界史著作不包括史前史，更不包括人类之前的地球史，可是威尔斯却把三者都纳入他的《世界史纲》。

赫伊津哈对施本格勒和威尔斯两人的批判都极其深刻，甚至可以说是“不太厚道”、“冷酷无情”。但你又不得不承认，他言之成理、击中要害。

他的点评精彩绝伦、令人击节。我们有节制地征引他的几段话予以说明。

“调子阴郁的《西方的衰落》……说理清晰，文采斐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历史诠释……在德国掀起了一场风暴……施本格勒就被捧上了文化英雄的宝座。”（158页）

“虽然《世界史纲》通俗易懂，但它和《西方的衰落》一样，是严肃的著作，意在确定世纪历史的意义、结构、真实的过程和范围。”（159页）

“凡是首次翻阅《西方的衰落》的读者，无不因作者的自负而觉得反感。几乎每一页都有刺眼的恭维自己的思想如何具有原创性的文字。”（160页）

“施本格勒《西方的衰落》底层隐藏的总体观念是历史与自然的对立……施本格勒将这一划分推向极端并以此为依据构建全书。对他而言，因果关系的、科学的、精确的和逻辑的事物是一个极端，审美的、直觉的和情感的事物是另一个极端。”（161页）

“施本格勒的著作里有一点极端令人悲哀的瑕疵，这一悲剧成分可以叫做日耳曼精神。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位思想家，其思想深刻、条理清晰、涉猎广泛，罕有能出其右者。然而，正如斯泰尔夫人所言，思想使大多数人心宁神静，却使德国人走火入魔……我们必须要和他分道扬镳——我们钦佩他，却又有几多遗憾；我们与他分手，几乎没有依恋或同情。”（189页）

“虽然有局限，威尔斯却以其谦虚和坦诚而引起我们的兴趣。他明确宣告，一切信息都是第二手资料，仔细标注文献出处——无论通俗手册、《大英百科全书》或其他著作都逐一注明。”（189页）

“《世界史纲》的时代错乱贯穿始终。”（193页）

“威尔斯对艺术的不敏感真有点莫名其妙。”（194页）

“虽然我对《世界史纲》做了一番恶评，但我心中充满了对作者最热烈、最诚挚的钦佩之情。”（208页）

“在这两位思想家中，施本格勒要深刻得多，他品尝了历史的一切智慧和美丽，为自己和同时代人找到了坚强、无畏和豪情。但他没有找到心灵的安抚。”（216页）

“威尔斯不重视艺术或仪式。他没有把握历史的伟大，因为他用现代的尺度去衡量历史。他夸大精密科学和技术的价值，成为其受害者。结果，他既不能理解历史，也不能唤醒历史……也许，他对理性控制之下的人性寄予了过高的期望。不过，在这一信念中，他的智慧远胜于施本格勒。”（217—218页）

6. 别具一格的审美路子

赫伊津哈热爱自然、热爱艺术，亦能作画，颇有艺术家的气质，他的历史研究别具一格，他开创从游戏和艺术的路子研究文化史和中世纪的路子，并旗帜鲜明地予以提倡，他的传世佳作《游戏的人》



和《中世纪的秋天》就是这条路子的丰硕成果。

《史学思想里的审美要素》这篇讲演词很值得一读，这是史学研究“审美”派的宣言书，是他向历史研究的“科学”派发出的挑战书。

他的挑战书说：“‘科学’派提出的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回答。我们可以挑战精确历史规律的主张者。”（221页）

他指出“科学”派的危害：“‘科学’派号称要用科学方法取代其他一切历史研究方法，从对科学派的批判中可以得出的两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结论。其一是：生活绝不能化解为一般的概念，承认每一次事件的独特性，始终是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第二条结论与第一条结论刚好相反。它相信，由于顺从预设的系统规则，历史研究不偏不倚的性质将受到条块切割的伤害，虽然不偏不倚是正好是科学派声称的目标。”（221—222页）

他回答他人的质疑时说：“审美态度如何以其召唤的力量提高我们鉴赏历史的能力？它协助我们在脑子里唤起活生生的图像……如果历史要完成其使命——唤起过去的情景，它就必须要跨越纯概念的界线，生动展现直觉的回应。换句话说，他必须要召唤动态的形象。”（237—238页）

他强调直觉、想象力、形象思维、审美眼光在历史研究里的作用，他总结自己治史的心得说：“在研究过去的一切表现形式时，历史学家应该要磨砺并提高他欣赏绘画和书籍的直觉能力。不过，他还必须熟悉自然背景，漫步草地，翻越小山，直到他觉得，洒在他身上的和煦的阳光再次照见了古人的生活。”（240—241页）

他对历史的审美观照给著名学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伊拉斯谟传》的英译者剑桥大学教授 G·N·克拉克在“英译者序”里记述了他对伊拉斯谟的近距离观察。20世纪30年代，他陪同赫伊津哈游剑桥大学时，赫伊津哈的博学多识和艺术家气质使他终身难忘：“这一天的游历却让我终身难忘。他熟悉这些古建筑的功能，熟悉缔造者和建筑师的意图……真正使我惊喜交加的是他那独具慧眼的洞察力……一般人很难具有这样的鉴赏能力。我对他的绘画才能早有耳闻，在和他边走边谈的过程中，我深受他坚强而沉静人格的感染，

他那艺术家敏锐的感知力和寻求真理的决心融为一体了。”（《伊拉斯谟传》511页）

关于他诗意图象的想象力，我们引用《游戏的人》里的一段话：“我曾经围绕一些中世纪的诗人、空想家和神学家的寓言式人物的理想价值，做了比较详细的探讨……（诗意图象）的形象实在是太丰富了……哲学神学思想深刻的含意，绝对要和这些形象捆绑在一起，是密不可分的。”（《游戏的人》162页）

关于他还原历史细节的功夫，亦可见《游戏的人》。他描绘秦晋两军对垒的文字细腻生动，其人物跃然纸上：“秦公和晋公两位贵族安营扎寨。两军对垒，排兵布阵，但不交锋。晚间，秦公派信使赴晋公大营，警告晋军备战：‘两军之内，不乏勇士，明日之战，决一雌雄。’但是晋军方面看到，对方信使目光游移，语气缺乏信心。秦军看来是不战而败了。‘秦军畏我！即将逃亡！快困秦军于江边！我们要打败秦军！’。然而，晋军却没有挥师进逼，反而让敌军安全拔营撤退。有人道破了这里的仁义之举：‘不收拾伤亡者，是为不仁！不等约定而战，逼敌蹈入险境，是为不勇。’于是，晋军按兵不动，让敌军从容撤退。”（《游戏的人》118—119页）

关于他描摹历史画面的功夫，我们引用《中世纪的秋天》开篇的一段文字。他描写法王查理六世讨伐叛逆的奥尔良人时，巴黎人倾城而出连续三个月的游行示威，那真像是当代的电影镜头：“游行从五月一直持续到七月，每次的游行总是有不同的社会团体、教派、行会参加，总是有不同的线路，总是用不同的圣物：‘在人们的记忆中最扣人心弦的游行’。所有的人都打着赤脚，空着肚子，议员和穷人无异；凡是有财力的人都手捧蜡烛，高举火把。许多儿童也加入游行者的行列。连巴黎周围乡村的穷人也赶来游行，他们也打着赤脚，急急忙忙奔跑进城。游行的也好，旁观的也好，人人无不为之动容，‘人们呼天抢地，挥泪如雨，洋溢着无尽的虔诚’。在游行的三个月里，大雨一直下个不停。”（《中世纪的秋天》4页）

他善于刻画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伊拉斯谟传》里有一段描写传主跨越阿尔卑斯山、创作《阿尔卑斯山颂》时的心情：“在万籁俱寂的阿尔卑斯山里，除了在书信中向塞瓦提乌斯流露的哀婉之外，



他的心灵深处升起了另一种渴望。但在这样的感怀里，他的渴望也是灵魂里一种迷离的因素，而不是那种强烈的冲动；给他指引方向、赋予他丰满人生经验的是那种强烈的冲动，这种冲动给予他难以抗拒的压力，敦促他不停地探索新的学问。”（《伊拉斯谟传》61页）

7. 刚柔相济的人生

本书还有许多亮点，比如赫伊津哈唯美的生活态度、潇洒的治学风格，面对《游戏的人》、《中世纪的秋天》等巨著的挑战，他举重若轻、甘苦如饴。实际上他承认，他写书从来不觉得是苦差事。他虽然起身较早，但从不夙兴夜寐，无论工作多忙，音乐是要欣赏的，到乡野散步也必不可少的。

他的生活刚柔相济。1933年任莱顿大学校长以后，仍然在繁忙之余写出那资料浩繁、轻松活泼的《游戏的人》。1940年5月德国法西斯占领荷兰，迫使莱顿大学关闭，他发表讲话，号召同事坚决斗争，深信光明未来。1942年，他被占领者驱逐到边陲小镇，三年后被迫害致死，那是在荷兰解放前夜。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下，他还是写写小品，把玩历史的活动从未停止。他的生活态度、工作精神和治学特色，请读者见本书收录的文章《我的史学之路》。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09年7月28日